



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

——《大别山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研究》评介

■ 安徽合肥 翁飞 吴泽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遍访革命故地、红色热土，每次都对新时期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作出重要指示，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大别山与井冈山、宝塔山称之为中国革命的“三座名山”，在这片神奇的红色土地上，大别山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一心向党、胸怀全局、浴血奋战、不胜不休，无数先烈为革命而献身，永恒红色基因记忆镌刻着我党我军的无上荣光，见证着那段激荡人心的峥嵘岁月，写下了“二十八年红旗不倒”的革命传奇，锻造了伟大的大别山精神，熔铸了独具特质的大别山红色基因。

红色江山，热血铸就；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由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吴长权等著的《大别山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研究》最近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部队和在大别山革命老区考察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新时代弘扬大别山精神的宏大视野，全面探究了大别山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问题，是一部推进大别山红色基因赓续传承的力作。通览全书，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注重统一性。将“大别山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科学问题，历史、全面、深入开展研究，深入挖掘与大别山红色基因形成、赓续传承的重要历史事件、突出历史人物，秉持论从史出，强化学理性支撑，较为系统构建了大别山红色基因代代传研究的理论体系。同时，又遵循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统一的思维线索，重点探究了新时代推进大别山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的实现路径，构建了大别山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的实践体系，实现了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统一。

二是强化系统性。对大别山红色基因的科学内涵、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赓续传承的基本经验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分析大别山红色基因传承制约因素的基础上，



对新时代推进大别山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进行了体系化的实践探索。内容上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填补了该领域完整性系统性研究的空白。

三是突出时代性。百年大党恰似风华正茂，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征程中铸就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目前在全党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该书丰富了大别山红色基因代代传的时代内涵，就如何加快推进大别山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给予了时代性的回答。

四是富有启发性。尝试界定了基因与红色基因、革命精神与红色基因、大别山精神与大别山红色基因等基本概念，阐释了其内在的区别与联系；凝练大别山红色基因的内涵实质、赓续传承的基本经验给人以理论的思考；提出新时代推进大别山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的路径对策管用实在，具有较强实践指导意义。

《智慧的光芒》：高考作文素材库

■ 安徽合肥 代立媛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明确高考“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强调素养立意，倡导落实“五育并举”。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将“应试”与“育人”完美结合，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成为当下教育的焦点话题。具体到作文教学中，如何指导学生写出一篇有文化、有情怀、有思辨、有逻辑的考场作文，显得尤为重要。亳州一中党委书记、校长王占峰带领全体语文教师，积极思考，勇于探索。他们意识到，新时期，新教育，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五育并举”的引领作用，是新教育的历史使命。2021年3月，由黄山书社出版的《智慧的光芒——高中语文老师写作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应运而生。此书实为优质作文教材，遴选汇聚近百篇一线高中语文教师的“下水”作文，按照《周易》的篇目顺序一字排开，每篇则选取各篇目中的经典名句引出话题，进而展开内容，文体不拘，记叙、说明、议论兼而有之。《周易》中蕴含的肩负正义勇往直前、宽厚为怀、厚积方能薄发、锲而不舍方能有成等主题思想，被剖析得明明白白，表现得淋漓尽致。

《周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被誉为“中华民族文

化之源”，是一部解读人生密码、关注自然规律、推演社会运行的智慧之书。《智慧的光芒》选择围绕《周易》来谈，目的不是单面向学生解读《周易》的要义，而是以其为出发点，选择合理角度，援引古今事例，属文成章，以丰富学生的阅读内容，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培养学生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深入浅出地引导学生了解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学生坚守民族文化的自信心。简言之，《智慧的光芒》就是要开启学生的智慧，使之在写作方面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文，从而提高写作素养。

全书前后贯通，着眼于“应试”与“育人”的结合，视角独特，语言凝练，新见迭出，为学生写作高考作文提供了丰富素材，具有较高的学习应用和借鉴价值。例如，对刚刚过去的2021年高考，语文作文命题充分体现了高考语文全面育人的鲜明导向，同时依托语文学科特点，紧紧扣住时代主题、时代精神，多方取材，巧妙设题，让学生在解题作答的过程中接受思想的启迪、文化的熏陶。那么，不管是全国甲卷“可为与有为”主题，还是全国乙卷“追求理想”主题，相关可资借鉴的素材在《智慧的光芒》中可谓俯拾皆是，书中谆谆告诫的便是，要有载物的厚德、自强的心理、谦逊的品质、悲悯的情怀……在此不举例赘述。

▶ 他山之石

闲说书评

“书评”这个话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实际上是要谈什么是好文章，同时又牵涉到什么是好书。这本来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儿。现在还要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种抽象的高度，探讨书评的“标准”和“品格”，难度就又加大了。而篇幅只有两三千字，显然，想完全讲清楚、说透，不大容易。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也正因为对这个问题大家看法不一，才有讨论的必要。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系统研究和高明见解，有的只是读书和工作中遇见的一些实例，以及由这些实例和一些流行说法不一致而产生的困惑。

关于书评，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书评是评介好书的，要把好书推荐给广大读者。一般来说，这话当然不错。我们在报刊上看到的大多数书评，也都是如此。但如果从宏观的意义上概括一个“好书评”的总的概念，这种说法就需要讨论了。从总体上讲，我甚至认为，这个说法是对书评的一个最大的误解。因为有许多书评，就是专门批评的，而且很有价值。俞平伯评丰子恺《子恺漫画》，就是一页一条地挑毛病。但这些意见，我们今天读来也仍受启发。《文艺研究》杂志有个书评栏目开了十余年了，其中的书评就多以批评性的为主。《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发表葛剑雄、曹树基的长篇书评《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指出杨著错误过多、漠视他人研究成果等问题，认为这部长达370万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从“总体上说是不合格的”，是“一个基本失败的课题”。这篇书评一万多字，列举了许多硬邦邦的证据，主题就是批评。书评发表后，学界震动，但普遍称好。李伯重先生甚至专门就此话题写了长文，经我手发表在《中华读书报》，李先生认为葛、曹这篇书评“使我们得以免去由洋人作裁判来对国人违规行为进行惩戒的尴尬，确实为我国人口史学界挽回了一些面子，所以我们应当为此感到庆幸才是”。所以说，评介好书或评书“之好”，只是书评的一部分。好的书评，并不就是“好书之评”，也不就是“评书之好”。

也有人认为，评论要全面、客观——这也不尽然。周作人1927年写过一篇文章《谈〈谈谈〈诗经〉〉》，通篇批评胡适的《谈谈〈诗经〉》。此文被收入钟叔河编订的《知堂书话》，可见算作书评，没有大错。周氏此文评论胡适的解诗“未免可笑”，“胡先生只见汉口有些纱厂的女工的情形，却忘记这是二千年的诗了。倘若那时有女工，那么我也可以说太史坐了火车采风，孔子拿着红蓝铅笔删诗了”。——您看，连讽刺带挖苦，这能叫客观吗？而且，对胡文其他方面的贡献和长处，周氏几乎一句没提，显然也算不上“全面”。而就所谓“客观”一说，也要看对谁而言。当年受葛剑雄、曹树基批评的那位学者，就认为葛、曹这篇书评一点儿也不“客观”，而是“学阀、学霸作风”。据我近30年当编辑的观察，书的作者绝大多数都认为评论家对自己著作的热情肯定、高度评价都是客观的，而且，评论者肯定得越是充分，评价得越有高度，被评论的作者就越会认为这篇书评非常客观。你把他比作鲁迅再世，他也大都会认为比较客观，虽然口头上会说过瘾，但绝不会愤怒。在我们旁人看来，大多数批评都是比较客观中肯的，虽偶有言辞尖锐、刻薄，但所论事实大体不差。而许多溢美之词与所评之书的实际的距离，要远远大于批评之于被批评者偶尔之偏差的距离。但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情况却是，大多数被批评者对于批评，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反唇相讥、恶语相加，有的甚至暴跳如雷乃至诉诸法庭；可对于明显过分拔高的表扬、赞美，让人肉麻的谀词，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见到过作家怒斥评论者严重失实、恶语诽谤的，当然更没有见到有人愤而将过度严重的赞美者告上法庭。

所以，凡是涉及“好坏”等价值判断的问题，都是相对的，都有一个在什么意义上、对谁而言的前提。这个前提不明确，许多问题讨论不清楚。不同的人，对书评的期待、要求和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出版社、出版商更看重的是宣传，作者希望听到社会反馈和有价值的专业意见；读者呢，一般读者希望通过书评了解书的大概内容和特色，而专业人士则关注书评所讨论的学术问题。这些要求深浅不一，正反面不同，口味各异，很难同时满足。

■ 内容来源：《文艺报》 作者：祝晓风